



走过红楼文集

Zou Guo Hong Lou Wen Ji

王兴科◎著



走过红楼文集

Zou Guo Hong Lou Wen Ji

王兴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红楼文集/王兴科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216-07692-0

I. 走… II. 王… III. 辛亥革命—文集 IV. 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745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编辑:余兆伟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游润华

责任印制:谢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387千字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7692-0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4.5

插页:2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4.5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近年老记挂编个集子，和业内、学界的长者、前辈不同，不是有宏富的成果汇编，也不是有系统的学术集成。主要的考虑，是一转眼，年届退休，工作一辈子，也该有个小结。此外，平日里爱翻检旧作，检讨与回味过往的所思所想，一编在册，也图个便捷。我也发现，自恋也是人情之常，原来不分高矮胖瘦的。当然，我也未能免俗。

书名是文稿汇编成册后想到的。这些文稿，要么是着眼红楼相关的历史与文化，要么是涉及红楼作为博物馆的工作；而文稿所见证的我的生活与工作的轨迹，没想到竟然是围着红楼转圈子，一转已然三十年！当在文稿中看出了红楼这个中心词，我割舍了到红楼工作前写的文稿，以及所写与红楼无关的文稿，力图使书稿变得纯粹，我惟愿读者在书中读出红楼的价值，读出红楼庄严神圣的样子，也读出我走过红楼所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

男人不只一面，博物馆人亦如是。外界对博物馆人的认识是不多的。我作为一个专题馆的博物馆人，工作的繁杂和多面也让我力有不逮。拿红楼这个馆来说，它是收藏保护机构，所以你必须搜集保护文物，特别是修复保护红楼的建筑和旧址；它是展示传播机构，你又必须懂得怎样通过以展览为主的媒介，形象化、通俗化地展示传播文物及相关知识；它是研究机构，你还必须研究红楼的历史，研究文物，研究怎样保护、展览文物以及怎样为公众服务；还有，红楼也是旅游景点，也是地方历史文化品牌，也是对台文化交流的基地。而红楼方方面面功能的发挥，是必须靠博物馆人的工作和研究来实现的。我的文稿，是我作为红楼的博物馆人的记录。因于工作的繁杂与多面，这些文稿的内容与文体也是多样的。编文稿是认识我自己的过程，编文稿也是探讨怎样展示一个博物馆人以便于读者认识的过程。最终，我选取了按文稿相关内容或文体分部分的方式，来组合文稿，希望这样有助于读者认识博物馆人，认识到如果



要做一个博物馆人，你还得愿意做一个杂家，做好多杂事呢。

辛亥史论排在文集的第一部分，也是文集最重要的部分。收文稿 15 篇，篇数约是全书 58 篇的四分之一，而篇幅是全书的五分之二。涉及史事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中心，包括武昌起义，鄂军都督府，以及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章太炎、蔡锷、吴兆麟等。这些文稿较典型地体现了博物馆人的史学研究取向，即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研究注重历史文献与文物。比如，《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是结合《辛亥革命史地图集》的编著写作的；《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考辨》，写作的考量，是关系到红楼的《鄂军都督府旧址陈列》，该不该复原“谋略处”；关于黄兴、吴兆麟家世的史论，是因为我参与征集到了他们二人的家谱；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的辨正，依据的也是馆里收集到的民国内务部的档案。

史论中自认有几篇较重要的文稿，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癖好，即关注说不清的问题，也试图说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看法。《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一文，针对的问题即兼辛亥革命参加者与研究者于一身的张难先条具的“武昌地方，四面受敌，当时全国人士，俱认不宜发难，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我从分析时人（主要是革命党人）的认识入手，指出时人已认识到武昌具备成为首义之区的地利，这种认识的深化与革命党人反清武装革命方略的抉择与实践相关。接下来，通过运用孙中山所提“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三条原则对武昌的衡量，指出 1911 年武昌的地利在于：武昌所驻新军的基本革命化为起义集聚了队伍；武昌、汉阳的军事、民用工业，汉口的商场，为起义准备了接济；武昌城本无要津、险阻，易于攻取；武昌位居中枢，轮轨交汇，一旦发难，易于号召天下，易于向四围进击。最后，从武昌首义的部署和实际运作，分析了革命党人对地利的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握与利用，并分析了武昌的地理形势作为客观的存在，怎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促成了武昌首义一夕竟功，及影响了后来的战局与政局。我的结论是，武昌有成为首义之区的地利，地利对武昌成为首义之区是起了作用的。

《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考辨》一文，是 2010 年写作的，当时我一边在筹备红楼《鄂军都督府旧址陈列》的改陈，一边在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911 年的那个分册。展览的改陈必须决定是否复原“谋略处”，长编的编

写又迫使我重新翻检相关文献。而我要面对的“谋略处”否定说，一是张海鹏先生的《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一是吴剑杰先生的《谋略处考》。二文写作的路径不同，征引史料的详略不同，但二文借以立论的主要依据相同，即洋洋百万言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二文的基本结论相同，即“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人们所称道的“谋略处”是参谋部的误记。我的考辨分了三步。先提出“谋略处”不宜轻易予以否定，理由是否定说也似有不可圆说处及忽略的地方，诸如第一，否定“谋略处”的存在无法填补鄂军都督府最初几天事实上存在的权力空白；第二，参谋部似不能与“谋略处”混而为一；第三，过于强调文献记载是对鄂军都督府建立之初非常状态的忽视；第四，早期文献关于“谋略处”的记述不可不予应有的重视。第二步，通过对实录馆档案文献等旧籍的重新检阅，可发现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谋略”有人；而把所引文献中办事或“谋略”的人名提取并加以综合，没想到获致了意想不到的认识，居然统计出了与史学著作、早期文献所述“谋略处”成员基本相同的人物，这些“谋略”也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并以蔡济民为核心。第三步，由贺觉非先生提出的“会议制形式”获得启发，再以史料佐证，指出“谋略处”或以“会议制形式”的组织形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个考辨受到了专家的肯定。我向冯天瑜先生两次请益“谋略处”问题，他赞同不宜轻易否定“谋略处”，我的文稿还未刊发，他就把我的看法引入了他新编的《辛亥首义史》。红楼的展览改陈时，吴剑杰先生也同意了复原“谋略会议室”。红楼的旧址陈列中，20世纪80年代是有“谋略处”的，90年代至2010年取消，2011年，“谋略处”改以“谋略会议室”的形式面世。我以为，“谋略处”真相不致因考辨、研究而更远离，而当更切近。

《放弃武昌与黄兴评价》一文，针对的也是一个自事实发生即聚讼不已的问题，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一开始即有肯定否定之说。民国元年，黄兴自己也几次辩解和解释。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间更是争论不休，肯定说和否定说截然对立。我的研究由梳理肯定说与否定说入手，而发现二说有一个立论的同一点，即均认为主张放弃武昌是一种过失。鉴于此，我提出反题：主张放弃武昌合理吗？研究发现，主张



放弃武昌不无合理性，这种主张是适应而不是违背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军事方面，汉阳失守后，武昌的军事地理形势已不利和军力已不济防守武昌，而夺取南京又是可能的；政治方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尽快建立起统一的革命领导中心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从而使得此时夺取南京已经比武昌是否失守显得更加重要。合理性规避了功过观，又蕴含了可能性。由合理性出发来认识和分析关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的史料，可以看到：民初武昌的一些革命党人所述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的史料较为可信；黄兴否定性的自述不无疏漏；个别较为含糊的记述则有试图缓和和淡化对立说法的意味。基于合理性的认识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结论是：尽管尚不能最终肯定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但是黄兴提出了这种主张的可能性最大。即使确认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也不足以对黄兴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作出否定的评价，理由是主张放弃武昌有合理性，又未成事实，更未引出恶果，无功过可言，何否定评价之有？这篇论文于1994年提交美国黄兴基金会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联合在北京举办的黄兴学术研讨会，后来美籍华人学者、黄兴之婿薛君度先生见到我说，你的论文我看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不用谈了。他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我的看法。而此后，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确实已不多见。

上述三篇史论表明，换个角度看历史，也许可以获致新认识。从地利的角度探讨武昌首义，丰富了武昌何以成为首义之区的认识；确认“会议制形式”或为“谋略处”借以存在的组织形式，也许不失为“谋略处”考辨与研究的新认识、新路径；研究主张放弃武昌的合理性，既有利于厘清史实，又有利于正确评价黄兴。在历史研究中，对于有争议的史事，我们不应首先考虑的就是评价，就是肯定或者否定，就是功或者过，而应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探讨其各种可能性，探讨各种可能性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多些历史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探讨，而不过分拘泥于功与过、肯定与否定之类的评价，历史研究中一定会少些公案和谜。

首义文化谈是关注地方历史文化品牌建设的副产品。2006年至2011年间，省社科联成立以马建中先生为组长，严昌洪先生和我任副组长的课题组，我们每年做一个关于首义文化建设的课题，诸如首义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首义文化产业、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等，都做过专题，也得过省市研究奖项。但

那些文稿是集体成果，所以这里没有收入。这里收入的是个人的几篇小稿子，值得一提的是《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这篇论文是我们做的《辛亥首义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它的价值是我尝试性地界说了首义文化、首义精神、首义文化资源等概念。我认为，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界颇受关注，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先生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红楼及展览推介的文稿按理该纳入首义文化谈，是因为文集主题的原因，所以我刻意把红楼突出了。这部分文稿份量不重，但反映的却是我的主要工作，也就是举办展览推介红楼。而这些文稿中可以推介的，我以为首先是《红楼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我并没有直接谈多少红楼的价值，我是就社会各界包括官方和学界的认识谈的，尤其是转述章开沅先生和张在元先生的认识较多。我的看法是，红楼的价值一方面是历史的存在，如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建筑价值等，另一方面，它的价值也由社会需要而派生，如教育价值、旅游休闲价值等。红楼的价值也是多样性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需要，可获致对红楼价值的不同的认识。追述既往，不仅红楼的从业人员，社会各界，包括官方和学界，均认识到了红楼的价值。问题是，我们该把红楼等首义资源纳入一个更新、更高的范畴来认识，这个范畴，即历史文化与人类遗产。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没有止境，对红楼价值的认识同理。另外一篇《以孙中山纪念地的名义——我的三次台北展览之旅》也值得一提，这篇纪实是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两岸文物交流 20 周年纪念撰写的，写的是我的经历，但反映的是红楼作为对台文化交流基地所做的努力。

博物馆研究收入 5 篇论文，表明了不同时期我对博物馆现状及发展取向的



思考。《试论博物馆人才的知识结构》一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反映的是那个年代博物馆人才知识结构的现状；而关于博物馆人才应具备的理想的知识结构，即知识的丰富性加知识的专业性的论点，在今天看来也是适宜的。《纪念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也写于80年代，写这篇论文一是因为红楼是纪念性博物馆，二是当年红楼聘请章开沅先生出任名誉馆长，章先生提出红楼要成为几个中心。刚好我读到王冶秋先生关于纪念性博物馆性质的讲话，我发现了学者们学理认识的一致性，因而写成了那篇论文。中心的论点是，纪念性博物馆的性质及其特点，决定了纪念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纪念性博物馆，应该是成为所纪念对象有关的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中心，所纪念对象及其有关的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宣传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所纪念对象的纪念中心。《论博物馆的文化本质》和《论博物馆产业化》两文，分别写于1992年和2005年，前者写作的背景是当时还有过分强调博物馆社会政治功能的现象，后者写作的背景则是各地方政府大比拼、大投入建豪华博物馆，我无意批评时弊，无非思考一下当时情况下博物馆发展的取向以及应该注意的方面。《博物馆公共审美谈》是新作，表达了我对博物馆美育的看法。

访谈、书评与编后见证和记录了我在研究方面另外还做的些事。一是出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自1993年开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由各省轮办改为由红楼独家出刊，章开沅先生任主编，吴剑杰先生、严昌洪先生和我任执行编委。1997年，经章先生提议，《动态》改由研究会秘书长主编，严先生和我分任正副主编。《动态》出刊至今，这种格局一直延续下来。这部分选刊的访谈与书评，就是我为《动态》写的，有的是主动采写的稿子，有的也是为了补白。二是和同事合作编著些书。这部分收入的编后，就是我出书的记录。除我写了编后的《辛亥革命史地图集》、《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辛亥革命大写真》、《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辛亥革命历史地图》、《辛亥革命图史》外，我主持编著的书还有《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这也是一座红楼》、《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8册、《辛亥革命文物珍品》、《流年似水——旧上海广告月份牌》等。这些集体项目，我有的署主编，有的署统稿，有的署副主编，有的署合编，但我都当作自己的作品一样费了不小的心力。当然，奖赏还是得到了。2001年，我以执行主编名义主持编

纂的《辛亥革命大写真》，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这部书的特色一是“大”，二是“真”。我主持编纂贯彻的思路即广采博集，再现历史。以原有零散、小型、专题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汇成系统、完整、大型的历史图集，形成有学术、文化价值的积累。这部书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十余年来，尤其是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最重要的、大量的图片资料来源，包括有关图书的插图，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拍摄，专题的展览等，大多取材于斯。

游记及其他是文集的最后一个部分，其中大部分是未刊文稿，我收入它们是以博物馆人也该走出程式化的工作与生活，并尝试体验新的文体与新的文风。几篇游记收入我最费思量，就像我当初要不要写出来一样。但是我写了，我就把它们收入。博物馆人平时较忙，差旅也多。我的游记是差旅的副产品。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年轻时未写，而年过半百了，反而感性起来。我初步的结论是，累了，要休息，忙了，想度假，理性的八股写作多了，就想自由信笔写来，生活、工作中缺少的，我们才寻求补偿。在《行路难——东北自助行一日》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说：“年过半百，我还是爱外出的行旅。大小长假，我会自驾跑近远郊；有机会公差，也是乐于前往。我想我的心中，还是难以泯灭一份希冀与情怀，远离那些工作与生活的烦嚣，人在旅途，走入自然，看一处风景，找一份单纯与宁静，不论山水，还是晴雨，都是最爱。”这应该是我心曲的表白。此外，旅行、游记也能丰富并记录我们该有的知识。赛里木湖游让我欣赏了天山风光，也感受了边疆蒙古族的人情美；而云南行，则丰富了我对祖国西南多民族文化的认识。有个友人曾对我说，参访的本质是学习，游览的本质是漫活。而我以为，参访游览本无绝对之分别界线，在漫活中学习与成长该是我们最优的选择。

最后这个部分除游记外的其他几篇文稿文体是不好统一界定的。《遥望南天》、《走过三十年》也许可以算随笔，剩下来的几篇是集会仪式上的脱稿演词。《遥望南天》是缅怀红楼的客座研究员刘望龄先生的，感慨的是人生短暂，学术绵长。《走过三十年》是我代表武汉大学历史系78届同学撰写的毕业三十年聚会感言，名义是集体的，流露的还是我自己的心声。我把我们这一代人比作武大校园里的梧桐树。梧桐没有樱花的绚烂浮华，也没有松柏的高雅伟岸，但它平实，粗壮，扎根深，枝叶繁茂，在人们最需要它的夏天浓荫庇



人。我感怀梧桐的性格，也感怀梧桐的命运。几篇脱稿演词收在文集末尾，是因为我的偏爱。这多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场合，也讲过话，做过讲课、讲座，但这几次是近两年的，印象较深。它们的共同点是：主办会的人都事先和我约过；限定时间，少的1分钟，长的5分钟；我会有个大致的腹稿，临场讲时有改变；会突出主题，注意起承转合；因为简短，我事后记录了下来。文稿的记述形式不是想排列成诗行，而是受和女儿、友人写电邮的影响。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长有关书稿的话，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我也明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因为没有什么学术的果实，所以只有唠叨所做的点事了。今年三月，本埠的近代史学界有次聚会，我上文提到过的章开沅先生、马建中先生、吴剑杰先生、严昌洪先生出席了，我馆的梁华平馆长和我也有出席。中午聚餐，酒过三巡，不知是谁把话题说到我的名下，说是王副馆长在红楼也坚持得够长了。要是在其他场合听到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汗颜，不过那天我兴致很好，我接过话题说，红楼不是做官的地方，也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如果要做官，我离开红楼了，如果要做学问，我也离开红楼了，惟因红楼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坚持下来了。大家说好，一起举杯。

三十年红楼走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是一个后进但不会掉队的博物馆人，就像跑马拉松的，拿不到名次，但会跑过终点。退休之前，我会像昨天一样走过红楼。

2013年初夏时节于红楼

目 录

自序 /1

辛亥史论

- 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 /3
武昌起义中旧军官扮演的角色 /20
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考辨 /35
辛亥湖北军政府官制与人事三题 /54
宋庆龄论辛亥革命 /65
宋庆龄论孙中山 /72
论孙中山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态度 /80
放弃武昌与黄兴评价 /84
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 /97
《经铨黄氏家谱》与黄兴家世 /104
黄兴世系考略 /116
有关章太炎被囚北京的旧档案 /125
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辨正 /132
论蔡锷民初的党派关系和政治理念 /135
《吴氏宗谱》记述的吴兆麟生平及其家世资料 /142

首义文化谈

-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 /161
“首义精神”论平议 /174
首义之炬 复兴之光 /176



- 首义胜迹掠影 /182
首义公园的变迁 /189
精心打造首义文化品牌 /195
循着先辈的足迹 /201

红楼及展览推介

- 红楼的价值 /211
民国之门 武昌红楼 /214
这也是一座“红楼” /217
武昌红楼与辛亥名流 /225
专家学者献良策 规划红楼新蓝图 /228
红楼颂中山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巡礼 /233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赴台举办“孙中山与武昌首义”展览简报 /236
历史的原色与历史的画卷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评介 /239
《流年似水——旧上海广告月份牌写真展》赴台展出纪实 /242
以孙中山纪念地的名义
——我的三次台北展览之旅 /247

博物馆研究

- 论博物馆的文化本质 /257
论博物馆产业化 /264
试论博物馆人才的知识结构 /273
纪念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282
博物馆公共审美谈 /287

访谈、书评与编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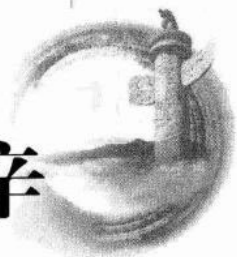
- 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

- 黄彦研究员、刘望龄教授谈《孙文全集》编纂 /301
- 片仓芳和谈宋教仁研究 /306
- 研究黄兴的新视角
- 《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简评 /309
- 百年之谜 水落石出
- 《慈禧是山西长治人》评介 /312
- 《辛亥革命史地图集》后记 /314
-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编后 /316
- 《辛亥革命大写真》编后 /318
- 《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 编后 /320
- 《辛亥革命历史地图》后记 /322
- 《辛亥革命图史》后记 /325

游记及其他

- 赛里木湖游记 /331
- 云南行日志 /338
- 长崎行点滴 /352
- 行路难
- 东北自助行一日 /358
- 遥望南天 /364
- 走过三十年 /368
- 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纪念展暨模型捐赠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词 /370
- 在北京中山堂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重点出版物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373
- 在首义广场“建设博物馆之城，走进博物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375
- 在欢迎日本长崎议会代表团仪式上的讲话 /377
- 在新疆博州博物馆《流年似水——旧上海广告月份牌特展》开幕仪式上的讲话 /378

辛亥史论



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武昌何以成为“首义之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不免有老生常谈，也不乏新论常新。按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中国传统史观，某事成功，某事失败，其中必是这三要素在起作用。笔者近编《辛亥革命史地图集》，偏重从地理角度、从空间的形式上认识辛亥革命，因而对三要素中的“地利”颇为看重。这似乎不失为一个新角度。本文即试图以此视角来看武昌首义，以期对武昌何以成为“首义之区”获致些许新认识。

武昌首义的地利问题，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却是以质疑方式提及。兼辛亥革命参加者与研究者于一身的张难先，在其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后序”中，条具八点轶出常情、令人索解问题，其第一条即为“武昌地方，四面受敌，当时全国人士，俱认不宜发难，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按张语意，是说武昌应算是没有发难地利的，何以成为“首义之区”呢？张的认识应该说是一个矛盾，一个疑问，它提醒我们：武昌首义的地利问题大有研究论述之必要；不然，是无法圆说武昌何以成为“首义之区”的。

武昌是否具备成为“首义之区”的地利呢？我们发现，时人（这里主要指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并且，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通过反清武装革命方略的抉择与实践，发生并深化了对武昌地利的认识。

按“首义之区”这个概念，本来是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对武昌的一个专用褒称，本文借用来，则泛指首先起义（并可以成功）的地方，等同或者相